

他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我

陈喜儒

李国文先生突然走了，我很难过。三天前，我还给他打电话，说在《文汇报》上看到他为汤世杰散文集写的序，文采斐然，思想深邃，干净利落，毫无老态，根本不像出自九十有二的老人之手，令人感佩。他说我已经九十了，身体尚可，只是眼睛白内障手术后效果不好，看东西费劲。遇到报刊上熟人的文章，很想看，但又看不了，心里干着急。他问我“你怎么样”，我说还行，每天看点书，散散步，偶尔写点小文章，自得其乐。他说，你的那些回忆文章，我也爱看。不少老人都走了，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他们，你在他们身边工作过，给他们当过翻译，有些事，你不写，别人不知道。能写，就多写些，有用。他问我同住一楼的老朋友写的文章，我说有的走了，有的搬了，所剩无几。他感叹唏嘘，让我代他向老朋友问好……

我已经好久未给国文打电话了，发现他听力很好，思维清晰，对答如流，心里很高兴，马上给汤世杰兄发了条微信，他当即在朋友圈转发，与大家共享。当时我还想，他如此硬朗，如此矍铄，是何造化！但万万没想到，说走就走了，而且是默默的，没有任何征兆！生命如此脆弱，如此神奇，如此决绝，嗚呼哀哉，悲兮痛兮。

屈指算来，与国文相识已经三四十多年，但我从未去过他府上拜访，他也从未来过我家，偶尔在一些场合相遇，也只是握手点点头而已。我们之间的联系渠道是电话和信。有事则长，无事则短。过去逢年过节还打个电话问候一声，这十几年连问候也免了，觉得无声无息就是平安。我虽然知道他的手机号，但不知为什么，从未用过，一直用他家的那台座机。就这样，若有若无地、云淡风轻地、藕断丝连地保持着联系。

国文的头很大，圆圆的，脸也很大，也是圆圆的。有人说这是福相，有人说这是佛相。还有人说，他就是当代文坛普度众生的活佛。理由是，他悲天悯人，慈悲为怀，乐善好施，不管是向他讨教文学创作方面的长短得失、经验教训，还是人生路上遇到了什么坎，判断是非曲直，进退去留，他总是以自己的创作、人生、满腹诗书典籍为鉴，开诚布公，鼎力相助，帮你做出选择。

我已经忘记与国文第一次见面的事由、时间和地点，但有一点没有忘，那就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知他是像我在敦煌、洛阳或云冈石窟中，看到的额头宽阔、慈眉善目、庄严自如的大佛，还是在古寺名刹中见过的高僧大德？反正不陌生。更奇怪的是，没说几句话，只是在旁边看了几眼，就出于生物的本能，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但又是切切实实的信任感和安全感。有些人共事半生，永远是路人，而他，只是一面，就走进了我的心里。

他才华横溢，出手不凡，先以小说名扬天下，长篇《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短篇《月食》《危楼记事》分别获1980、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专事历史随笔，独辟蹊径，《大雅村言》，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尤其是在他由小说家变为随笔家之后，神游千古，针砭时弊，谈古论今，涉笔成趣，进入一个更广阔、更神奇、更有魅力的天地。他毫不留情地揭露、挖苦、鞭笞中国古代和现代文人的丑恶，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常使我想起：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窃以为，在当代作家中，参透人生、历史、现实、文人卑劣根性的，很少有出其右者。

他德高望重，睿智渊博，沉稳于书海学林。我虽敬慕有加，但从不敢与他称兄道弟，妄称朋

友，自认为，只是他的一个读者而已。与他的交往，也淡如空气，无色无味透明，把对他的敬重，深深地埋在心底。

1998年初春，他给我来了一封信，附一张《读书人报》(1998年2月18日)剪报，上面有篇题目为《作家写作应有多少良心——山崎丰子名作〈大地之子〉被剽窃始末》的文章。

他为什么寄我这篇文章呢？说来话长。山崎丰子是日本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她直面日本社会的敏感领域的矛盾冲突，以锐利的目光透视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勇敢揭露日本政界、财界、医务界、企业界既相互勾结利用，又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丑恶黑幕，入木三分地描绘出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贪婪、腐朽、堕落，深刻地反映了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入稳定发展这一时期社会的畸形和黑暗，人、家庭和社会的腐化堕落。评论家说，她的创作实践，积极严肃地回答了日本现实主义文学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了日本神话般变为经济大国，成为亚洲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暴发户的历史进程，为日本战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高度统一的标志性的作品。

她的小说，冲突激烈，情节曲折，悬念丛生，人物个性鲜明，本本好看，部部畅销，动辄发行几百万部。每年年初，不少就业的大学生，把她的作品当成社会教科书，念医科的读《白色巨塔》，念金融的读《浮华世家》，念商科的读《不毛地带》，而且她的大部分作品被反复多次改编为电视剧、电影，在日本不断播映。

山崎丰子在中国，也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她的《浮华世家》《白色巨塔》《女人勋章》《命运之人》《不毛地带》等多部作品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远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她就是中国读者熟悉的日本女作家之一。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闪烁着强烈的批判光芒的作家，在日本文坛却声名狼藉。有的说她出尔反尔，言不守信；有的说她妄自尊大，目中无人；有的说她品行不端，抄袭成性；有的说她性格古怪，喜怒无常；有的说她唇枪舌剑，恶语伤人；有的说她狂傲猖獗，我行我素。总之，她是日本文坛的一个怪物，一个异类，一个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丧门星，一匹独来独往的狼。

在她的种种“劣迹”中，最要命的是剽窃，而且每次都闹得沸沸扬扬，鸡飞狗跳，满城风雨。1968年，她的小说《春宴》被指控剽窃，说其中部分情节与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名著《凯旋门》和芹泽光治良的《巴黎夫人》相似，于是舆论大哗，闹腾了好一阵子，她因此沉默了好久。1973年，她的《不毛地带》又被指控为抄袭，刹那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她又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最后诉诸法律，不了了之。1983年9月，她的新作《两个祖国》刚刚出版，《舆论评论》就带头发难，说她盗用了别人的资料，《周刊评论》《周刊朝日》《图书新闻》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一时间风起云涌……

1983年秋，山崎丰子到中国访问，我陪她访问了北京、西安、杭州、上海，会见了巴老。后来，她为写日本残留孤儿，曾先后三次自费来中国采风，我也曾多次抽空陪她访问有关地区和人士。她前后用了八年，写成了一部洋洋近百万言的长篇小说《大地之子》，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在中国生活、读书、工作，后来为中国钢铁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日本残留孤儿的形象。

甫一出版，风靡日本，一时间洛阳纸贵，一册难求，前后发行四百多万部(分上中下三卷)。日本广播协会为纪念建台七十周年，投资二十五亿日元，邀请中国演员朱旭、吕中、蒋雯丽，与日本著名影星一起拍成同名电视剧，不仅在日本反响热烈，而且在1996年蒙特卡罗国际电视节荣获最佳电视作品大奖。

然而，我万万没想到，这本书也惹上了官司，筑波大学教授远藤誉控告她剽窃，要求她公开道歉并付律师费150万日元。日本各大报文化版均以较大版面报道此事，将两人文章中相似之处列表刊登，让读者比较判断。

我感到蹊跷的是，为什么山崎丰子剽窃事件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发生，而又每次都不了了之？莫非是资本在背后操纵作祟，花小钱办大事，目的是吸引读者的眼球？若果真如此，也太卑鄙无耻了！

我写过两篇关于山崎的文章，可能国文看到了，知道我关心这个问题，所以特意剪下这篇文章寄我。收到剪报，我顿时明白，他在默默地注视着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还有一封信用的是毛笔宣纸，是国文给我的所有信件中最漂亮最讲究的，可当墨宝珍藏。

喜儒白：

你好！寄去的票两纸，请予报销。何时得便，聊聊日式料理，诸如味噌汤之类，向兄请教，

该多好！顺此祝笔健。

李国文 九月十日

票两纸，是出租车收据。当时请作家参加研讨会或外事活动，无车接送，更无红包或车马费等任何变相报酬。家远者，可以打车，之后再打车票寄给我，我到计财处报销后再寄还，所谓实报实销，倘若十个人参加，就要分别报销十次，这个制度不知是哪位官老爷决定的，执行多年，极为麻烦，但即便如此，我每次请他，都是有求必应。这是我请他参加日本作家入江曜子作品研讨会的来往车票，我在信封后面还记下了车费总共50.4元。

1989年春天，我到日本访问时，日本作家春名彻、入江曜子夫妇计划到中国采访，来饭店与我面谈。入江曜子送我我以伪满洲国“皇后”婉容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伊丽莎白——(伪)满洲国皇帝之妻的生涯》。当年初冬，春名彻夫妇来中国访问，我在欢迎宴会上说，入江塑造了一个在中国舞台和屏幕中还没有的婉容：她从小在法租界长大，学英语，弹钢琴，打网球，热爱自由，追求幸福，一心想到英国留学，是个有理想有追求的现代女性，但却成为封建小朝廷的至尊至贵的“皇后”，在日本军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遭受灵与肉的折磨，使她由黑发如云、仪表非凡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只能在鸦片的麻醉中，寻找刺激和安慰的行尸走肉……



笔会

鄂达克建筑之二
(国画)
洪健

想起老屋

史良高

在这个秋天，我搬进了新居。终于有了城市人津津乐道的主卧次卧，客厅餐厅。于我来说，最值得欣慰的是拥有了一间十余平方米的书房，有了一个能安放灵魂的地方。

宽大的阳台前方就是云波流涌的绿浪，我每天被绿浪簇拥着，裹挟着，仿佛置身于富氧的山林。它使我倏然想起了那幢在老街的老屋，想起了在老屋里蜗居一辈子的父母，如果两位老人健在，看到儿子的阁楼美宅，夜色里的一片辉煌，该是多么的兴奋！

父亲有一年出差上海，归来后有十天半月沉浸在幸福之中。他说，南京路，干净的那就跟你水洗的一样，盐发了，也能捧起来。上海国际饭店，知道吗？那可是24层楼哇，好好好高啊，一抬头就会摔帽子。父亲对城市的高楼大厦岂止是羡慕，那简直是五体投地！我参加工作后住的是毛竹芦席油毛毡搭就的工棚，被子就铺在地上的稻草上。我写信回家，不敢告诉父母实情，胡诌自己的宿舍就在城市里高的高楼之上——其实我的工厂坐落在一个叫“九里十八湾”的偏远郊区。结婚时，我借住单位图书室一隅，用书柜隔开，拉了一道蓝色塑料帘帘子就是所谓的洞房。父亲来看后，什么也没说，回到家却给我写了一封足足五张纸的长信，那位老学究在信里劝慰我，眼光看远一点，胸怀放宽一点，屋宽不如心宽！

其实，老人家的内心深处是希望儿子能住上高楼大厦，风风光光的，他就可以在亲朋面前挣足面子。可惜，高楼大厦于他的儿子，在当时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住进新居后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想告诉他，我的楼栋就是24层，和上海国际饭店一样高！可惜，老人已经去了天国。我还想告诉他，我住的是小区最矮的一栋，我的周边邻居，哪一座楼不巍峨挺拔，哪一座楼不是四十多层？

父亲在全面抗战烽火刚刚燃起的那一年，携结婚不久的母亲来到了滨湖

的一座古镇。那时候，父亲着一身灰不溜秋的老布衣褂，他是镇上一家南货店的小朝奉，母亲则是一名以机器织袜的女技师。他们凭着自己的一份汗水和诚恳在小镇立足下来。那时候，他们上无片瓦，租居在别人屋后披厦里，与猪圈为伍，脏乱不堪。冬天太冷，为了御寒，他们就在棉袄上拴根草绳，再套上草褂，以此让身体有限的热量减缓散发。

我降生在老街老屋的那天清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才刚刚开始实施。母亲说，我出生的那一刻外面正在“落令”，屋瓦上叮叮当当响成一片。我后来读过几本书，知道凡是有出息的人物降生，必定是紫气东来，彩霞万丈，神光满室，异香不散，而我却在“落令”的那一刻来到人间。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注定了我一生的平庸凡俗，碌碌无为？母亲说的“落令”，我一直懵懵懂懂。后来，我反反复复查阅了一些与气象有关或无关的资料，认定母亲说的“令”应该是“凌”，又叫“冰凌”或“冻雨”。我还知道，那是强冷空气与暖湿气流相汇而成。冻雨，比下雪还要寒冷。母亲在那座空旷高大寒风萧瑟的老屋，在饥寒交迫之中，不知是如何熬过了那一个个漫长的日子？

那幢老屋原是一户唐姓人家的“裕隆茶馆”，上下两层。来底层喝茶的多是一些码头上的短衣帮，粗茶，大碗，说话粗声大气，就着油条、锅巴、萝卜干喝大碗茶，侃跑码头的异闻和湖水里的渔

事。唯有那些戴着礼帽的长衫客，他们要去阁楼上找个位子坐下来，一边喝着猴魁、毛峰，一边透过木格窗棂，倾听楼下的市声，瞄瞄涌动的人流，街市的风景。他们捧的是景德镇细料青花瓷盖碗，品的是袖珍小麻花、油糍、小笼汤包、玉带糕、桂花饼……底楼茶馆的一隅是商店，商店里一年到头经营的是日杂杂货。茶客们喝完茶，刮完淡，也就快到吃中饭时间。那些江湖客已早早地扬帆远逝，来自乡下的茶客们没有忘记他们在街上除了喝茶，还有家人的叮嘱，于是就忙着在店里买一些生活用品捎回。家有红白喜事的，是顾不上喝茶的，急急匆匆地挑着茶馆里的点心和商店的货品往回赶。我的父亲，其时便是这店店铺的主人，他的店铺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信泰。

1954年的那场洪水过后，曾经繁华鼎盛的老街成了一片废墟，一部分商户回到了老街，一部分人留在了一座叫巢山的脚下。因了泛滥洪水，留在山下的那条自然形成的街道，后来就美其名曰新街。而原来的一座古镇则成了传统意义上的“老街”。古镇有些年头，从汪洋恣肆的洪水涤荡过后残留的桁桷上可见，那上面没有一根铁钉，而是由竹钉固定。对门三爷说，竹钉，经桐油铁砂炒过，比铁钉还要坚硬无比。街上的

老街，被洪水冲刷得一蹶不振。我记事的时候，我家的信泰商舖已荡然无存，它在父亲的张罗下率先走进了合作化行列。临街的茶馆与店铺经过一番修葺后，放置了一张张洁白的病床，成为医院的住院部，后来，又改做了中药舖。每天，我都是在金黄赤亮的铜钵叮叮当当的捣药声中，碾集碾药时散发的药香中度过。中药舖里那数不清的抽屉格格的中药名称，增添了我幼年识字兴趣。夜晚，父亲就在煤油灯下教我读《百家姓》《三字经》《朱子治家格言》。我是在中药舖里认识了我后来的高中同学大水。大水的名字，应该与1954年江堤溃破有关。当时的他扎着一条长得及腰的辮子，肉嘟嘟的圆脸很是讨人喜欢。若干年后，我们在高中成为同班同学时，大水却再也记不起我们在我家老屋里玩泥巴躲猫猫，去街后菜园的篱笆上捉蜻蜓的趣事。大水的伯祖在我们家乡

是一位有名的中医，也是一个富有传奇故事的人物。据说他在山庄行医偶遇“狐仙”，从此出言吐语，禅意隽永，连开出药方都是四言八句，他作的辞赋诗词在坊间一时广为流传。

我家的阁楼上也长年居住着一群“狐仙”，她们与我们一家人和谐共处，相安无事。许许多多多个夜晚，我就睡在阁楼之上，与“狐仙”相依相伴。可我终究没有《聊斋志异》里的那些白面书生的艳福，大大小小的“狐仙”们也没有赋予我一丝半点灵气，每每回想起来，似乎是一件多大的憾事。

父亲说，我家的“狐仙”，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一场大水淹没了一切，可等到父亲把屋子架起之后，她们居然又回来了！这群“狐仙”，一直被视为家中神祇，是我们家一团解不开的谜。每年正月初一清晨，放完开门炮，父亲总是带我登楼，在一只木柜上摆上供品，敬上香茶，上一炷香，燃三张金纸，对着一尊已经发黑的“大仙”牌位叩首作揖，以示敬重。

阁楼上的“狐仙”，我多年前已经在另一篇文字中介绍过。老屋之所以招来“狐仙”，足以证明其古老晦暗，阴气肃杀。自从药舖搬离，临街门面的一扇扇沉重的木门就很少有人能够卸下，木门不卸，加上街道逼仄，光线自然不太充足，踩着吱呀响着的楼梯上楼，就像穿行在无边黑暗的隧道，而那些幽居于老街的人，闲散，缓慢，自足，像是落在时光后面的一枚枚符号。

父亲的老屋有前后两进，洪水过后，后面倒塌的那进房子就一直辟为菜园，也植些花草，小时候我常常在园子里捉蜻蜓蝴蝶，逮蚂蚱蜗牛，把夏天的萤火虫养在玻璃瓶里学车胤囊萤。后院还有一种叫屁虫的虫子，你若抓住它，它就会掀起背翼放出一股带烟的臭屁来，很臭。在你一松手的瞬间，它就逃之夭夭。随着弟弟妹妹长大，老屋愈显逼仄。那年婚后，我想回家过年，父亲觉得老日的房子不便接待做大夫的

儿媳，临时动议在后进的屋基上构筑一间简易平房，并专门去邻家相商，获得邻居首肯。可在鸣放鞭炮拉起土时，我那可爱的邻居说什么也不肯，说是房子盖起，势必遮挡她家光线，影响风水云云。在自己屋基上盖房，又招谁惹谁了？为了息事宁人，父亲少不得拿出几张大钞，用两条大糕压着，包上红纸隆重地送到邻居家，方便风波平息。

若干年后，下隔壁的书英老师打来电话，说是晚上的一场大雪压坏了我家老屋桁架，必须尽快抢修，否则将要倒塌。而那个雪灾天气，四处白茫茫一片，山高路远，怎么回得了老街？父母经营一生相伴一生的老屋，就在那场雪灾中寿终正寝。

再次回到老街，穿枋老屋已成一片瓦砾，唯独前街那堵马头墙还昂首苍穹，不失往日雄伟的气势。而父亲辛辛苦苦加盖的屋后平房，早已夷为一片平地。再看隔壁人家，地面废墟上长着青油油的杂草，一片荒芜景象。父亲母亲没有了，仿佛眼前是一枚仅存的硕大符号。就在我为老屋倍感沮丧时，有几位昔日的街坊邻居围拢过来，有的说这里要推平建一座临湖休闲广场，有的说一条高速公路就要从这里经过。我倒希望，有一座高楼能从废墟上拔地而起，那是父亲一生的期冀。



「文汇报笔会」
微信公众号